

2005 年 12 月  
第 15 卷 第 4 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Dec. 2005  
Vol. 15 No. 4

# 1978—2003 年间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概况

胡小鹏 程利英

自 1978 年以来,国内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发表论文约 144 篇,涉及广泛,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明代西北政治史方面的认识。本文试对此作一简介,因目力和涉猎所限,引述可能并不完善,不足之处,敬请赐教。

## 一、总论

明代西北既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是连接各民族地方政权乃至中亚各国的通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王朝在该地区的政治举措均以安定民族关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着眼点。因此,1978—2003 年总论明朝对西北经略的文章主要围绕其民族政策和相关军政制度展开。

### 1. 宏观经营方面

秦川《明政府开发西北决策的若干启示》(《兰州学刊》1991 年第 1 期)和《试论明朝在西北的退缩战略与开发西北的决策》(《社科纵横》1992 年第 4 期)两文,概述了明政府在抵御蒙古势力、巩固西北边防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开发西北决策,分析了明朝在西北采取退缩战略的原因及其结果,总结了其经验教训。其后,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民族研究》1994 年第 6 期)和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两文,认为明朝经营西北的总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重点经营甘青藏区且获得了成功,有效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应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秦川《试论明政府经营西域的失误》(《兰州学刊》1992 年第 5 期)通过全面分析明政府对东察合台汗国的政策以及对关西七卫态度的变化,指出明政府在经营西域方面存在失误。刘国防《明朝初期对西域的管辖和往来关系》(《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认为,明初经营西域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设立哈密、撒里畏兀儿诸卫所,进行较直接的管辖;二是遣使招谕,对瓦剌、别失八里、于阗、哈实哈儿等地进行政治上的羁縻统治。指出明初对西域的管辖和经营是积极主动的,并取得许多成就。此外,黄东辉《中国历代王朝对新疆管理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和张德阶《略论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两文,在相关部分简述了明王朝对新疆的管理政策。

### 2. 军政建置方面

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历来是边防要地,明代在此设有宁夏镇与甘肃镇,以控御周边各族。余同元《明代九边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论述了明九边的概念、形成及其影

响。肖立军《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南开学报》1994 年第 2 期)重点考察了九边营兵的大致编制和将领设置等,分析了九边营制对以后镇戍兵制的重要影响。梁森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和《明代九边的募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分别探讨了明代九边军数与有明一代政制、军制、边防、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明代九边募兵的来源、特点。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和《试析分权制衡和以文制武思想对明代九边防务体制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两文,全面分析了明代嘉隆两朝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因及其造成的明军战斗力低下和朝廷防而不和的民族狭隘思想等恶果,指出分析制衡和以文制武是明代九边防务体制的指导思想,但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这一指导思想在事权、督饷、用人等方面的运用扭曲了它原来应有的作用。以上研究都涉及到了宁夏镇与甘肃镇的设置沿革及其地位作用等方面的内容。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石家庄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则对九边设置的时间进行了考辨,确定九边初设于明成祖时期,明孝宗弘治年间设置完成,其中宁夏镇、甘肃镇属于初设边镇,设置时间分别为建文四年(1402)和永乐元年(1403)。该方面的研究还有邓沛《明代九边述要》(《中国方域》1997 年第 6 期)和《明代九边考述》(《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等。除了以上总论性的研究外,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地区性考述,也介绍如下:

宁夏地区:薛正昌《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指出三面环长城的宁夏镇是凭借其固有的天然屏障特别是贺兰山,来完成和体现它在明代的军事防御中的地理作用。范宗兴《浅谈明代宁夏东路的军事建置》(《宁夏史志研究》1992 年第 3 期)则对宁夏东路的军事单位进行了考述。苏银海《明代经营固原概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强调了固原在宁夏镇边防中的作用,勾勒了明代经营固原的历史过程。余贵孝《明代固原的军事设置》(《固原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薛正昌和张九芳《历代兵制与固原》(《固原师专学报》2001 年第 5 期、2002 年第 1 期)、王恽《元明清时固原地区概况述略》(《固原师专学报》1986 年第 3 期)、罗丰《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固原师专学报》1986 年第 3 期)等文,也涉及到了明代固原地区的建置情况。鲁人勇《宁夏境内的明代长城三题》(《宁夏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则就内边、历史文献的真伪、长城对交通的影响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忠礼《明封宁夏一世庆靖王朱旌》(《宁夏史志研究》1997 年第 2 期)对分封于宁夏的宗藩进行了研究。明代宁夏曾多次发生兵变,并与明末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学界对此也有论述,其中龚《试论明万历年间的宁夏兵变》(《宁夏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一文,阐述了明万历时宁夏发生的“哮拜之变”,认为它是一场边兵反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对晚明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年农民起义》(《甘肃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概述了崇祯元年(1628)固原兵变的历史意义及其与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或间接关系。高树榆《明末起义在宁夏一带的活动》(《宁夏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介绍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宁夏活动的原因、范围、经过和结果。

甘肃地区: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3 期)通过考述甘肃镇的独特地位,揭示了该镇在明王朝的国防体系和对外贸易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他在《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一文中还指出明廷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扶持,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兰州是明宗藩肃王府所在地,赵一匡《明清时期的兰州府》(分载于《兰州学刊》1984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指出明朝时鞑靼是兰州的主要威胁,肃王移驻兰州后,兰州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过去重要起来。他的《明代兰州二三事》(《兰州师专 1982 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也对兰州府进行了研究。邵如林《甘肃明肃王初探》(《西北史地》1992 年第 4 期)则对历代肃王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进一步探讨。宋法仁《明肃王对兰州的贡献》(《甘肃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结合明肃王家族在兰州的历史活动,论述了他们对兰州的贡献。梁新民《元代永昌路与明代永昌卫、清代永昌县的关系问题》(《西北史地》1985 年第 1 期)推测明代的永昌卫很可能就是在元永昌宣慰司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斌《元明清三朝在河州的地方组织》(《档案》1986 年第 6 期)论述了元明清时期河州的地方组织问题。陈世明《明代甘肃境内二十四关考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系统介绍了明代甘肃南部崇山峻岭中积石关等二十四关及所处地理位置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青海地区:崔永红《明万历年间郑洛经略青海述略》(《青海史志研究》1985 年第 1—2 期合刊)考述了万历年间郑洛对青海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将其措施归纳为“断其假道”、“招抚番部”、“散其党羽”、“焚其寺刹”四步,认为其经略粉碎了蒙古封建领主蚕食两河地区的企图,恢复了藏族部落对明廷捍外卫内的藩篱作用,在客观上也有恢复民族地区社会安定、发展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张维光《明朝在青海的军事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一文,概述了明朝在青海的军事设置和重要军事活动。赵宗福《明代“湟中三捷”考评》(《青海社会科学》1987 年第 5 期)认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湟中三捷是明代边疆战斗史上重要的战事,对稳定西北边防具有重要意义。王子贞《明崇祯间西宁卫镇海民马安邦聚众反明事件考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分析了明朝政府处理该事件的失误和事件背后的民族因素。姚继荣《甘青境内的大通与明代大通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考证出明大通苑设置于今互助县双树乡大通苑村,从永乐四年(1406)初设到正统二年(1437)裁撤,前后存在不过 32 年。

## 二、西北民族地区的卫所建置与民族政策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多元,地区差异很大,明政府的治理策略也因时因地而异。根据民族分布与明朝政府的措置,大致上可分为河西走廊嘉峪关以西的蒙古、撒里畏兀儿、维吾尔等族,明朝在此设关西七卫进行羁縻统治;河湟地区则以藏族、土族等为主,明朝在此设西番诸卫,土流参治,形成了独特的统治形态。

### 1. 关西七卫研究

以哈密卫为首的关西七卫是明代西北边政研究的热点之一,自上世纪 30 年代岑仲勉先生发表《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 7 卷第 2 期,1936 年)以后,关于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时间较早、较为重要的论文有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邓锐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第二辑)、吴均《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等文,唐文在分析了关西七卫的设立过程、与明朝之间的茶马互市和贡使往来、七卫的废弛与民族的交融后,指出关西七卫的设置对于巩固西北边陲,维护明王朝的统一,以及促进内地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进步作用。邓文和吴文则着重考释了诸卫的地理位置、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及有关史事,对史料的搜集与解

读堪称精详。钱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西域研究》2002 年第 1 期)、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甘肃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等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设置关外诸卫的利弊进行了研究,并剖析了关外诸卫衰亡的主客观原因及衰亡带来的后果,特别是钱文对诸卫内迁过程论述较详。

除了以上整体研究外,学界对关西七卫特别是哈密卫还进行了集中研究。蒿峰《明失哈密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田卫疆《论明代哈密卫的设置及其意义》(《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1 期)两文,阐述了明朝设置哈密卫的背景、经过、作用、意义及撤销原因,所论大致相同。蓝建洪的《明代哈密卫撤销原因新析》(《新疆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更为细致地分析了哈密卫的建立、四立四失、撤销及其原因。赵予征在《明对西域的统辖及哈密卫屯垦研究》(《西域研究》1994 年第 3 期)中重点阐述明朝在西域册封各部首领为王、设哈密卫等统辖措施,并对哈密卫的屯田史实进行了研究。刘国防《明朝的备边政策及哈密卫的设置》(《西域研究》1998 年第 4 期)一文,在明朝备边政策的背景下,剖析了哈密卫几立几失的原因。作者的另一文《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 剑桥中国明代史 的相关部分》(《西域研究》1999 年第 2 期)通过对明初哈密历史的研究,指出由美国牟复礼和英国崔瑞得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中对 14—15 世纪哈密与明朝的关系、哈密王的族属、哈密王族的信仰等论述中存在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于默颖《明代哈密蒙古的封贡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重点考察了哈密卫的册封、朝贡问题。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 4 期)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哈密危机的由来、统治者处置的种种失误和嘉靖前期的解决过程。

## 2. 西番诸卫和甘青藏区研究

明代在甘青藏区设立了河州、西宁、洮州、岷州等卫,管理当地的藏族等部落,称西番诸卫。这是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的又一重点。陈庆英《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一文,指出明代对甘青藏区的政策是依靠对藏族僧俗首领封授官职,通过他们管理地方政教事务,同时利用和藏族僧俗首领之间的贡赐关系及茶马贸易等政治、经济利益来使藏族首领对明归附。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系统研究了明朝在甘青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基本政策及其意义。陈光国、王浩勋《明清时期青海蒙藏关系和中央王朝对蒙藏的政策》(《中国藏学》1989 年第 1 期),杜常顺《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秦川《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1 年第 6 期),尹伟先《试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管理政策》(《西北史地》1992 年第 4 期),甘措《论明朝统治河湟及湟水流域藏族分布状况》(《青海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等文,也先后就明朝对青海各民族实施的招抚、设卫所、推崇佛教、推行土司制度、移民实边、茶马互市等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考证了明初西番诸卫、纳马诸族及其分布、明代中后期河湟藏族诸部落及其分布。张维光《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则对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制度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荣宁《明朝在青海地区的施政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一文,对明政府在青海地区“土流参治、多封众建”等六条措施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安定边防等,有一定积极作用。王继光《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连载于《西北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2 期、1999 年第 2 期),从《明实录》、明代或清初方志中辑出明代安多藏区的藏族部落资料,分隶于河州卫、西宁卫、洮州卫、岷州卫、秦州卫、松潘卫六卫下,就其名称、分布及活动进行了考述,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对西番各卫的具体情况也有专门的研究。

河州卫:西番诸卫以河州卫为首,元时在此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统治安多藏区,并连接卫藏地区。明朝一度在此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作为治理整个藏区的军政中心。王继光《明代的河州卫——明史·西番诸卫传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强调了河州卫在明朝与藏区建立政治关系过程中的历史作用,高度评价了河州卫的历史地位,就其建置沿革、开发经营作了初步析理,指出河州卫虽然有大量“世袭其职”的土官,但主要权力掌握在汉族流官手里,是典型的土流参治、以流管土模式。河州卫的建置标志着甘青藏区土流参设制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州卫就是西番诸卫的一个缩影。

洮州卫:丁汝俊《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仿照王继光对河州卫研究的路子,探讨了明代洮州卫的职能和主要作用,对当地的土流参设制度、土司制度、宗教政策、茶马制度、军民屯田等进行了细致研究,肯定了明朝经营洮州的成就。海洪涛《明王朝前期统治洮州各民族措施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概述了明朝前期统治洮州各民族的八条措施,指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洮州各族的统治,使此地明朝前期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不断发展。

岷州卫:桑杰《简述明朝对岷州藏区的治理》(《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对岷州卫军政建置加以考述后,指出岷州卫也是实行“军统民摄”、“土流参设”制度的,并且广设寺院,建立汉番僧纲司,采取了笼络扶持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宗教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吴均《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则综合考察了河洮岷重要的枢纽地位,明朝在该地的经营及当地三杰班丹嘉措、班丹扎喜、释迦巴藏卜在密切明朝与藏族关系上做出的贡献。

西宁卫:骆桂花《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探讨了明代在西宁卫实施的土流参治等各项政策,揭示出该政策对青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崔永红《明代青海之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考证了李文是陕西华阴人,并非青海土著李赏哥之子或六代嫡孙,并介绍了李文的戎马生涯及宦海沉浮概况。

此外,吴均《明代在玉树地区建置初考》(《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对明代在玉树地区设立的陇卜卫等卫所、昂欠国师等僧官、入藏通道通天河渡口管理机构及相关部族进行了考证。

### 3. 明朝在甘青地区的宗教政策和土司制度

明朝时期,在中央政权的扶持下,甘青藏区的藏传佛教势力进一步发展,政教合一制度开始形成。张维光《明朝政府在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政策述论》(《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阐明了明王朝通过扶持藏传佛教及其代表人物番僧,加强了自己对藏区的影响,达到了安定民族关系、巩固边疆的目的。陈玮《试论仰华寺与青海蒙藏关系——兼谈明王朝治青方略的演变》(《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围绕青海蒙古第一寺仰华寺兴毁始末,探讨了仰华寺在这一时期青海蒙藏关系中的历史地位以及明王朝治青方略演变。糖吉思《仰华寺与蒙藏关系》(《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指出仰华寺的建造揭开了蒙藏历史关系的序幕,仰华寺在当时不仅是青海蒙古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是环青海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青海蒙古的坐大威胁到明廷的西北安全,为“绝其祸本”,明军在清剿青海蒙古的过程中焚毁了仰华寺。

从元代开始,土司制度在甘青少数民族聚居区已经出现,明承元制,继续在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张维鸿遗稿、张令瑄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 年第 12 期)、牟一之《青海土司制度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和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 年第 6 期)等文,是较早对甘、青两地的土司制度进行探索的文章,内容偏重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 年第 3 辑)对甘青土司制度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他的《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甘肃社会科学》1985 年第 4 期)继续论述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对甘青僧俗土司分别作了叙述,研究了土司制度在西北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 年第 3 期)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论述了明清时期青海土司制度和十九家土司历史兴衰,指出青海土司大都先有军功和官职,后授土司名号,故其属民分散各县,并非世代聚居一地;土司大都由卫所长官演变而来,因而都是武职,且以明代兵制为依据。陈新海《土司制度对青海社会的影响浅谈》(《柴达木开发研究》1997 年第 1 期)重点谈了青海土司制度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此外,王继光《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述评》(《青海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专门对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进行了考述。米海平《明代土官李英事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概述了西宁李土司家族中李英的生年事迹,指出李英在明初保塞抚番,维护了西陲安宁,并注重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辛存文《对辛土司的考察记略》(《青海史志研究》1985 年第 1—2 期合刊)利用史书和宗谱资料,结合实地采访,对明代以来西宁辛土司的族属、世系传承、辖域进行了考察。马志勇《河州土司何锁南》(《甘肃民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通过探讨元末明初河州归降首领何锁南的族属籍贯,考述了河州何土司的辖域及其组织。徐步云口述、徐旺次力整理的《临潭县咎土司概况》(《甘肃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3 期)介绍了明代以来临潭藏族咎土司世系传承及其衙门的组织管理情况。

吴均《论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把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的组织形式归纳为三种模式,即西纳模式、隆务模式(包括卓尼禅定寺政教合一制统治)、郭隆模式(包括拉卜楞寺的政教合一制度),使我们对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的类型有了一个宏观上的认识。政教合一制度的主要体现是僧纲土司的普遍存在。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认为,从明代以来,安多藏区存在并延续着一批僧职身份的土司,他们在朝廷封授的各级番僧纲司的名号下,受到“一切政治悉因其俗”的政策保护,从而具有一定的政教权力。僧纲土司的基本特征是叔侄相承的家族世袭制,其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叔侄相传的单一僧官体系、僧官与土官的双重家族统治体系——“兄为土司、弟为僧纲,如遇独子两职兼”。这在我国土司制度中是十分独特的。僧职土司是这些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表现形态之一,其产生与明清王朝特殊的民族宗教政策有关。

#### 4. 茶马互市研究

民族贸易与经济来往是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甘青藏区的茶马互市是其中的一种主要形式。明王朝把茶马贸易当作控制少数民族、巩固西北边防的战略方针,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茶马制度。谢玉杰《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论述了茶马制度的形成,茶马交易的方式,茶马贸易中的管理机构、茶课、茶运

及马价问题,以及茶马贸易制度的崩坏过程,认为茶马贸易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陈一石《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比较侧重于茶马贸易中的消极方面,认为“以茶取番”是茶马互市政策的出发点,茶马制度缩小了藏汉互市的窗口,抑制了藏汉物资交流。赵毅《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对官营茶马互市中的两个特点——差发马制度和朝贡互市进行了探讨,肯定了茶马互市政策对明王朝加强对藏区的统治,扩大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积极作用。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对茶马互市的背景、形式以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政策清楚地表明明朝中央政府对藏区行使了完全主权。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从不等价交换、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方面阐述了该体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剖析了导致这一体制衰落的根源。石莹《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勾画出明代西北官营茶马互市与商营茶叶贸易间势力消长的演变全貌。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市场》(《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归纳了黄河上游地区民族贸易市场的四种类型,指出以农牧产品交易为主的贸易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意义上的质的变化。

金牌制是茶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了明代民族政策的特点,历来学者对其性质和作用多有争论。解秀芬、文韬《试论明初茶马贸易的“金牌制”》(《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对金牌制兴起的原因、金牌制的内容、实施过程及其后果、金牌制废止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论述,认为尽管金牌制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它对促进茶马贸易,增强西北少数民族的向心力,抵御蒙古侵扰有重要的作用。叶玉梅《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金牌信符制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着重考证了纳马诸族与具体的制度规定。彭建英《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认为有关金牌制是赋税制度或带有强制性的贸易制度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提出金牌制兼具国家赋税和贸易两重性,并对金牌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代西北马政是明朝经营西北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的一个重要制度,与茶马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机构废置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对西北马政机构设置的缘起、处所、废损情况及其原因,做了详细论述,并进而探讨马政机构兴废对整个西北马政的影响。谢玉杰《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明代西北茶马贸易研究之二》(《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论述了杨一清整顿茶马的背景、过程和措施,认为杨一清的整顿使明政府以很小的代价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其恢复国家对茶马贸易垄断的政策,既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因而无法取得根本的成功。张明富《杨一清与明代西北马政》(《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认为杨一清督理西北马政4年,大刀阔斧地整顿马政,极力主张恢复茶马旧制,成绩出色,保证了西北边镇的战马供给,尽到了他所能尽的最大职责。

### 三、明朝与西北民族地方政权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为了修筑自己的西北屏障,开通西域商道,建立与西域各地的联系,明朝与西域诸国及蒙古展开了一系列交往。赵倬生《明朝的西域关系》(《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认为明初与西域的关系是积极的,朱高炽即位后,则基本停顿下来。王治来《公元第十到第十五世纪中国同



中亚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 年第 2 期)涉及到明朝建立后与西域及中亚的关系,指出至 15 世纪末,陆上丝绸之路隔绝,为海路所取代。孙振玉《明代丝路史分期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将考察明代丝路史分期的重点放在天山南北两路,并具体分为三个时期:明初至天顺末年为第一时期,明王朝和帖木儿帝国是该时期左右丝路上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势的两大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新王朝的统治者朝气蓬勃,使丝路得以重新开通和发展;成化初至嘉靖中为第二时期,该时期土鲁番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梗塞在丝路要冲,使整个丝路的国际关系恶化,战争频繁,丝路交通受到严重阻碍;嘉靖末至明亡为第三时期,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古老丝路渐趋沉寂。

### 1. 明朝、蒙古、西域诸地的互动

白翠琴《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就大漠东西蒙古(主要是瓦剌)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回回人在蒙古统治机构中之作用等问题做了论述。马曼丽《明代瓦剌与西域》(《西北史地》1984 年第 1 期)探讨了明代瓦剌与西域关系的几个问题。樊保良《察合台后王与瓦剌封建主及明王朝在丝路上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认为 15 世纪初瓦剌与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发生的重要关系,构成了西北民族关系既紧张又联系的局面。

### 2. 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

陈高华《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考察了明代土鲁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速檀的世系及与明朝的关系,认为从永乐四年(1406)到明亡前夕,土鲁番与明朝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具体分析了各个时期双方关系的基本状况。魏良弢《明代及清初土鲁番统治者世系——兼述东察合台汗国之变迁》(《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一文,对明代土鲁番统治者世系做了进一步探讨和补充。田卫疆《明代哈密吐鲁番速檀(王)世系补正》(《新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对冯家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 哈密、土鲁番世系表》中缺阙的诸速檀(王)名字、在位年代进行了若干补正。刘国防《关于明代前期土鲁番统治者世系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一文,对明代前期土鲁番统治者世系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土鲁番地区成为东察合台汗国领土的一部分,15 世纪中叶前,能称得上统治者的可能仅有哈散王子一人。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的统治重新回到察合台后裔速檀阿黑麻手中。孙振玉《明代别失八里(含亦力把里)——土鲁番王统考述——从黑的儿火者至速檀阿黑麻》(《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一文,将《明实录》与《拉失德史》的记载相参照,考述了明代别失八里政权及其下属诸地面(含亦力把里、土鲁番)头目的世系或传承,并列出其王统世系表。

### 3. 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的关系

主要论文有孟凡人《论别失八里》(《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及田卫疆《明代蒙兀儿斯坦王系初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明朝前期东察合台汗国与中原间关系初探》(《新疆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满速儿、赛德汗时期的东察合台汗国史述略》(《新疆历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的东察合台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4 期)、《十五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历史探幽》(《民族研究》1988 年第 5 期)、《东察合台汗国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往来联系》(《甘肃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东察合台汗国建立史实考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东察合台汗国地域范围及其变迁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0 期)等。



叶尔羌汗国是从东察合台汗国独立出来的一个地方政权,魏良弢对其有系统研究。他的《叶尔羌汗国政治史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概述了叶尔羌汗国的历史过程和政治特点。他的《叶尔羌汗国的创建和巩固》(《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从探讨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地区创建政权遇到的困境及其解决入手,叙述了叶尔羌汗国的创建过程,肯定了汗国创始人萨亦德汗的历史功绩。《叶尔羌汗国的发展和昌盛》(《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论述了拉失德汗翦除朵豁刺惕部异密势力,收复蒙古斯坦,阿不都·哈林汗和马黑麻汗继续加强汗权,叶尔羌汗国步入昌盛时期的史实。他的《叶尔羌汗国的衰落和覆亡(上)(下)》(分载于《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1、2期)则认为汗国内部的教派纷争导致了内乱和覆亡。他在《叶尔羌汗国疆域考释》(《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取1600年为标准年代,考证了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汗国边界四至,并对其形成和变化详加考释。《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和官制》(《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叶尔羌汗国社会经济概述》(《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还分别讨论了叶尔羌汗国的行政体制、官制及社会经济情况。

#### 4. 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关系

和龚《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浅说》(《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考述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臣往来,指出除了洪武二十八年到永乐五年(1395—1407)期间双方关系一度中断外,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基本保持了通商贸易的友好和平关系。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帝国初创时,帖木儿主动向明朝称臣、纳贡;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张文德《论明太祖时期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明成祖至孝宗时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两文的观点与朱文大体相同。马骏骥《析帖木儿·上明太祖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通过对该表文的研究,认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关系。张文德在《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依据《明实录》记载,着重探讨了中亚帖木儿朝来华使臣的身份、性质及明朝给予的待遇。同类文章还有高永久的《帖木儿与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纵观近二十五年来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策(约31篇论文)、国家政权关系(约29篇)、军事活动(约23篇)的考察方面,一些文章论述还相当深入。其他方面研究则相对较少,如对明朝、蒙古、西域诸地互动的研究仅有4篇文章,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约5篇)和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关系(约7篇)的研究也相对薄弱。

(作者胡小鹏,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利英,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